

祭獺食蹠

辛德勇 著

J I T A S H I Z H I

卷之十一 史記十一

春景里帝者曰景里 季文之十一已

季文在代前居有上留及善入后行前居此全列

子史死故者得五九月四月七日 城六下已

賜氏前一賦五月除回半相為序又立春景

合章目無胡智初秋代代均和號

二年春封叔相國南河德萬德萬山陵東甲

子下而得傳四月士年 君又八月廟 廟川世

抄王皆之國丞相甲局 嘉季八月以作文又太

附封侯國府而空何皆聖出宋北飲衡山兩

也天者五寸深者三人管嚴道行穿此屋月出

於夜間廣星運行入建中置而後及內史殺

相後縣人者蓋已分四又為子名及成州為無其事第二

十傳也

二年正月己巳救天下景里出四方六六 金唐曰

燔碑明水官大殺賊差 一作推 吳王薄 楚王

代趙王遂服西王字 備南王屏九晉川王賢

膠水主雄漢及黃若西向天子馬球汽頭道來

益節 皆不正 運西園 梁上乃遣大將軍 曹嬰

大尉周亞夫得兵錄七月己未救 此軍及楚

九王子整牙美後及者封人將軍 曹嬰之子而魏

具侯立楚九王子平陸侯劉德也 楚王立亞

子福為祿白王子勝為中山王侯濟北王在而魯

川王淮陽王餘而魯王汝南王作而江都王春子

精麗函王善皆亮也 依唐曰本

四年夏五月己未立皇子徹為膠水王六月甲戌

秋大破九月庚子陽為陽侯復置津閉用

傳出入 危初曰大者十五至除開 此因得子安因合傳

西門子明得子持卷也八開 今以趙國而邯 邯那

今之介得風者之傳也

七年九月國曰宗

五年三月作陽侯得倫五月嘉侯陽侯子致

二千可邯 大累為以中子承 壞城十二天丁命

封景公王子 端為陳侯侯侯唐川五而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順為遠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春唐曰 道平侯隗而太子 邯 邯 邯 邯 邯 邯

祭獺食蹠

辛德勇◎著

J I T A S H I Z H I



祭獺食蹠
餘廣地經志云文帝七年置獺祭地經志曰百官長南相復獺祭地經志曰分司文武及州府縣皆書二
千傳皆知
 文帝五年已救天下長皇出西守天穴徐廣曰吳
碑陽東晉大殿城吳一作吳王濞楚王
代道王遷膠西王濟而王屏九番川王賢
郢東王遷膠西王濟而王屏九番川王賢
益論云不止遂而梁上乃遣大將軍實勇
入府固不得其狀之六月七日天取止軍及楚
九王子
其侯立楚九王子陸侯劉僂焉楚王立空
王為郢西王子勝為中山王使濟代王志為晉
王王孫陸王餘為晉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香子
將應王王孫皆死徐廣曰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熊為郢東王六月甲戌
秋八月九月庚子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
傳出入南有巴城單曰臣已若年十月十日傳黃帝
兩門南陽界方諸至八八開齊以趙國為郡郡
今之方傳黃帝之傳也
地理志曰趙國界也
 五年三月作陽陵園橋至周蒙使陽陵王錢
 二十萬江都大暴民從四方來壞城十二天子
 封穀公主子矯為陸廣侯使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主建陵侯使江都丞相嘉
徐廣曰為建平侯隴西太守復那為平曲侯
陸相劉聖善曰為江陵侯使行軍布為郢侯
楚之王皆薨後九月代加趙國南池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祭獺食蹠/辛德勇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6.3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
ISBN 978-7-101-11455-3

I.祭… II.辛… III.中國歷史-古代史-文集
IV.K2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00331 號

書名 祭獺食蹠
著者 辛德勇
叢書名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叢刊
責任編輯 胡珂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4½ 插頁 2 字數 372 千字
印數 1-2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1455-3
定價 85.00 元

自序

編錄在這裏的，主要是我近年撰寫的有關歷史文獻研究和鑑賞的文章，另有幾篇，是以緬懷前輩師長或談論古今學術為主題。一如既往，所涉及的典籍相當雜亂，時代從先秦到晚清，性質則從煌煌正史到上海灘上無聊文人的遊戲筆墨。從哪一角度看，似乎都無所歸依。給文集起名，依然還是一件難事。

內容既然駁雜不純，就祇好動腦筋從形式上找共性。這些文章論述的問題，都瑣瑣不為大雅所屑，就像啃雞爪子，儘管也有些肉，但祇那麼一點點。把啃雞爪子這事兒妝點雅化一下，即為“食蹠”。另一方面，我這些文章還都不避繁複，累累贅贅地大量羅列史料，或是排比引證類同的史事，猶如獺之祭魚。這種做法，顛倒語序簡約言之，便是“祭獺”。合此二端，就把這部文集題作“祭獺食蹠”，從其實也。

我自知駑鈍，無論怎樣努力，也絕不可能把學業做成事業。藉用清人俞樾講過的話，讀書寫文章，不過“聊賢于無所用心而已，固不值大人先生一笑也”。這是我述學為文多隨興之所至的一個根本原因。也正因為如此，纔隨手撿到什麼就研究什麼。當然，由於眼界低下，揀到的都是一些瑣碎微末的

題目。如果一定要談對治學的路徑有什麼自覺認識的話，那麼，我很喜歡宋人程頤論道時講的一句話：理無大小，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即使真的對學術這一“事業”有所追求，我也希望自己老老實實地走下學上達這條路。這樣，假如運氣足夠好而且壽命也足夠長的話，說不定哪一天真的能夠有所開悟，由卑近而稍至於高遠。不然的話，抗之以為高，鑿之以為深，恐怕明眼人更要為之齒冷了。

至於論證問題，一味雜陳史事史料，在我自己的行文技巧方面，固然缺乏簡練的表述能力，但另一方面，在主觀追求上，我也更想通過豐富的史事史料來說明問題。清儒治學，考據一個問題，常常需要舉述衆多論據。如王念孫動輒徵引十數證，曲暢其說，以明一字之義。我們與古代歷史之間，相距很遠，存在諸多隔膜，研究者的主觀認識，很容易出現偏差。舉述足夠豐富的史事史料，展開更嚴密的論證程序，斟酌於句讀文義之間，關注更多的細節，都有助於我們儘量減低這樣的偏差，使研究結果更具有實質性意義。

昔朱文公嘗有語云：“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論證歷史問題，要想做到“極仔細”，談何容易，需要具備太多太多的知識，讀太多太多的書，但治學的趣味也正在讀書求知的過程之中，吾心嚮往之。

2014年3月25日記

目次

自序	1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	1
一、唐以前文獻所見《三國志》書名	1
二、由版刻和寫本的題名看《三國志》本名	14
三、魏、蜀、吳三書與《國志》的刊印流傳形式	33
四、《國志》得名緣由	50
公序本《國語》“我先世后稷”文證是	59
題周啓晉先生度藏舊抄本《釣磯立談》	94
題蘇繼頤先生舊藏清抄本《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99
《長安志》出版說明	110
記東方朔《五嶽真形圖序》存世最早的寫本	113
雒陽武庫鍾銘文辨僞	132
我書架上的《孔子家語》和《家語疏證》	144

仿真新印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二支兒字

史料價值略述	157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十九庚形字史料價值辨析	178
紹良先生舊藏出相本《佛說阿彌陀經》刊刻年代小考	201
題天一閣舊藏明刻本《天台集》	217
一、存世最早的山岳詩文總集	217
二、《天台集》與《天台續集》的作者	224
三、林表民對《天台集》和《天台續集》的增訂	230
四、《天台集》的郡齋刻本性質與李庚的籍貫問題	235
五、天一閣舊藏明刻本與《四庫》寫本的關係及其文獻價值	240
紹良先生舊藏影印本《四松堂集》識語	245
瞭書娛壽	247
雕鐫天花亂墜的世界	
——由一本貌似無聊的小書來看清末舊式雕版印刷	260
簡論清代中期刻本中“方體字”字形的地域差異	274
一、蘇式方體字	282
二、浙式方體字	292
三、粵式方體字	305
四、京式方體字	315
初入師門	322
史念海先生創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季刊的經過	327
【附】史念海先生《述〈中國疆域沿革史〉書》	334
悼念陳橋驛先生	338
為古史延續命脉	
——《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入選書目》	
之史部書籍評議	343

受難的先賢

- 鄭燮賢《鄭鄭研究筆記》序言 348

讀書得間 慎守其獨

-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序言 352

從尚功到守文，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 355

爲什麼要寫《製造漢武帝》？ 365

- 一、對於我來說，歷史學首先是史料學 366

- 二、科學的認識，往往需要反復論證檢驗 369

關於一篇訪談的談話 373

- 一、楊守敬研治《水經注》的成就與不足 374

- 二、顧炎武與乾嘉學術的關係 376

- 三、學術問題要少“談”慎“講” 378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

西晉陳壽所撰記述漢晉間魏、蜀(漢)、吳三國史事書，自《隋書·經籍志》以來的公私簿錄，著錄時都是以《三國志》作為名稱，唐代以來特別是宋代以後的文人學士，誦讀研治其書，大多亦若此稱謂，至少尚未有人提出過不同說法，正如繆鉞所云：“如此稱呼，千載相承，並無異議。”^①然而，覈諸西晉李唐間相關記述以及傳世早期版本，可知這並不符合當日實際情況，流俗相傳，不過積非成是而已。

一、唐以前文獻所見《三國志》書名

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有人述及陳壽此書，當推西晉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頴，在陳壽去世之後，上表請求司馬氏朝廷采錄這部書稿。唐太宗時官修《晉書》之陳壽本傳，摘要錄有范頴的表文，書作：“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

^① 繆鉞《〈三國志〉的書名》，刊《讀書》1983年第9期，頁150—151。

垂采錄。”^①看起來似乎與後世通行的書名相符，不存在什麼問題，故范文瀾乃謂：“據傳文，《三國志》之名當是壽自定。”^②

然而，稍後劉知幾在唐中宗景龍年間撰著《史通》，記述同一史事，卻是另外一種寫法：

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頹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采錄。于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③

所說惟徒舉“國志”兩字，與《晉書》的記述明顯不同。不僅如此，劉知幾在書中提及此書，還屢屢使用這一稱謂，如稱“陳壽《國志》”，或謂陳壽“撰《國志》”云云^④。

雖然在《史通》當中，偶爾也能看到“三國志”的提法，但仔細斟酌，卻不像是正式的書名。如該書《題目》篇評論魏收《魏書》的標目方式云：

必如(魏)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者也。^⑤

文中“《三國志》”與“《兩漢書》”恰好相對為偶，很像是為湊成駢偶而綴加“三”字于《國志》之上，或者是為拼湊儷句而採用了這種俗稱，而若所謂“三《國志》”云者，即指書中魏、蜀(漢)、吳三大構成部分。又如其論補注史籍事云：

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

①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八二《陳壽傳》，頁 2138。

② 范文瀾《正史考略》(北平，文化學社，1932)之“三國志”條，頁 51。

③ 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二，頁 347。

④ 如《史通》之《列傳》、《斷限》、《稱謂》、《探蹟》、《人物》諸篇，見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二，頁 47；卷四，頁 96，頁 108；卷七，頁 211；卷八，頁 238。

⑤ 唐劉知幾《史通·題目》，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四，頁 93。

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①

這裏同樣是以“三《國志》”與“兩《漢書》”對舉。與此等儷句稍有不同的是，劉知幾在《自叙》篇裏講述自己少年讀書的經歷時談到：

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于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②

顯而易見，與《史》、《漢》並稱的“《三國志》”，依然是一種隨意的表述，而不是莊重的稱謂，同樣會對書名有所變易^③。

《史通》的論述，是在專門討論史書的撰著方法，因而需要反復展讀引證原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元和長慶間人李肇曾著有《經史釋題》二卷，“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錄，列篇帙之凡，概釋其題”^④，宋人王應麟謂李氏有自序云：“經以學令爲定，以《藝文志》爲編；史以《史通》爲準，各列其題，從而釋之。”^⑤由此可見，《史通》正式稱述的史籍名稱，應該比較準確，在社會上具

① 唐劉知幾《史通·補注》，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五，頁132。

② 唐劉知幾《史通·自叙》，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〇，頁288。

③ 案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在敘述裴松之《三國志》注時（頁347），稱“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但覈諸明嘉靖間陸深刻本（卷一二，頁8b）和《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萬曆刻本（卷一二，頁10a）《史通》，此處俱書作“言三國之《志》者”，文氣自較浦起龍本爲勝，此即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八八《史部·史評類》“史通通釋”條（頁751）所說浦起龍氏“輕于改竄古書，往往失其本旨”之處，故應以這些明刻本爲是。又案上述嘉靖、萬曆兩本，在《古今正史》部分，都刊有一些小標題，如“右說《春秋》”、“右說《史記》”、“右說《漢書》”、“右說《後漢書》”、“右說《三國志》”云云，浦起龍《史通通釋》（頁329—330）云“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斟酌上下文氣，此處所說當可信從，因而並不能據以判斷劉知幾稱謂陳壽此書所使用的正式名稱。

④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八《藝文志》二，頁149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重印《萬有文庫》之《十通》本）卷一八五《經籍考》十二“經史釋題”條引宋《崇文總目》，頁1587。

⑤ 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四二《藝文》之“唐經史釋題”條，頁802—803。

有很高權威。基于上述情況，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斷，劉知幾所據陳壽之書，其正式的名稱，應是題作“國志”。《史通》另有句云：“《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①僅用一“國”字來簡稱該書，尤其能夠證明這一點，而這正與劉氏書中引述的范曄表文相對應，這也就意味着《晉書·陳壽傳》載錄范曄上表時恐怕並沒有完全照錄原文，而是依從當時通行的俗稱對文字有所改動。蓋《晉書》本傳記述陳壽著書事便是書作“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②，其引述范曄表文，書名正與之相同。

東晉時期留下更多記載，可以進一步證明上述推測。如袁宏撰《三國名臣序贊》曰：“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唐呂延濟注云：“《〈國〉志》謂《三國志》也。”^③又如裴啓《語林》有句曰：“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④

同時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更不止一次提及《國志》。如謂“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已）詳矣”^⑤。又書中載群臣奏請李雄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耻之。（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⑥還有其《先賢士女總贊》稱“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⑦；其《序

① 唐劉知幾《史通·敘事》，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六，頁175。

② 《晉書》卷八二《陳壽傳》，頁2137。

③ 梁蕭統《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六臣注本）卷四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並唐呂延濟注，頁2940。案《晉書》卷九二《文苑傳·袁宏》（頁2393）載袁宏此文同。

④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七二《食物部·米》引裴氏《語林》，頁1245。

⑤ 晉常璩《華陽國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本）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頁471。

⑥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頁671。

⑦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〇下《先賢士女總贊》下，頁829。

志》稱“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①，所說《國志》，都是指陳壽之書。

不過《華陽國志》中還有一條與此明顯抵牾的記述，這就是在《陳壽傳》裏記云：“壽乃鳩合三國史，著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②就文獻譌變的一般規律而言，在《國志》與《三國志》二者之間，更有可能後人根據當時世俗通行的稱謂來把《國志》更改為《三國志》，而不太容易出現相反的情況。

《華陽國志》流傳到南宋寧宗嘉泰年間，就已經“刊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假守臨邛”的李至在校刊此書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于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譌謬，大略十得五六矣”^③。簡而言之，李至這次校刊《華陽國志》，既無善本可資勘比，就只能依賴所謂他校、理校。在這種情況下，舊本當中保持的一些作者原貌，就很可能因其與後來已經產生變易的流行說法不符而遭改換，劉琳在校勘此書時就指出過一些這樣的錯誤。如當時曾依據《史記》、《漢書》的記載，將原文楚頃襄王時莊躄伐取夜郎事，改訂為莊躄在楚威王時伐滇，使得常璩原文面目全非^④。所以，今本《華陽國志》謂陳壽書“號《三國志》”云者，很有可能也是這樣被李至一輩刻書之人由《國志》更改而來（書中其他《國志》沿襲不改，應是被其視作簡稱，不像這裏講述正式的書名，非予以“改正”不可）。

劉知幾《史通》在記述因范頽上言而詔命河南尹就陳壽家中寫錄《國志》一事之後，又提到南朝宋文帝令裴松之注釋此書的事情：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

①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頁 901。

②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一《後賢志·陳壽傳》，頁 849。

③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末附宋李《重刊華陽國志序》，頁 1005。

④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附劉琳校注，頁 335—337。

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于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①

這裏同樣稱裴松之所注書名爲《國志》。相互參證，愈加證實其上文引述范頽表文，應當準確無誤。

劉宋文帝詔命裴松之注釋《國志》事，其更爲原始的史料，見《三國志》附刊所謂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文曰：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②

唐人許嵩在《建康實錄》中摘錄此表，文字相同^③；宋人王應麟在《玉海》中引述這篇表文，也同樣只是書作“國志”^④，可證並無奪落舛錯。惟近人陶元珍乃謂劉知幾《史通》等處稱此書爲“國志”，“蓋由行文之便，……非是書總名有異稱也”^⑤；後來繆鉞等人也以爲“所謂‘《國志》’者，亦即《三國志》之簡稱也”^⑥，或謂這是“爲了簡約其辭，或便稱舉，或駢偶其文而已”^⑦。今案裴松之這篇進書表是上達天聽的莊重文書，而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云云是在復述宋文帝劉義隆詔書的文辭，不容隨意簡省，這段話亦並非駢句，足見“國志”二字必屬陳壽之書的正式名稱。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所謂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係以“三國志”稱謂陳壽此書，似乎與表文所說“國志”相矛盾。實則這一表題，應爲後人擬加。如同宋元版本《新唐書》亦多附刊有提舉監修官曾公亮的進書表，其中有些

① 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二，頁347。案“世言三國之《志》者”，原文作“世言《三國志》者”，此據明刻本改，請參見前文注釋。

②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末附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頁1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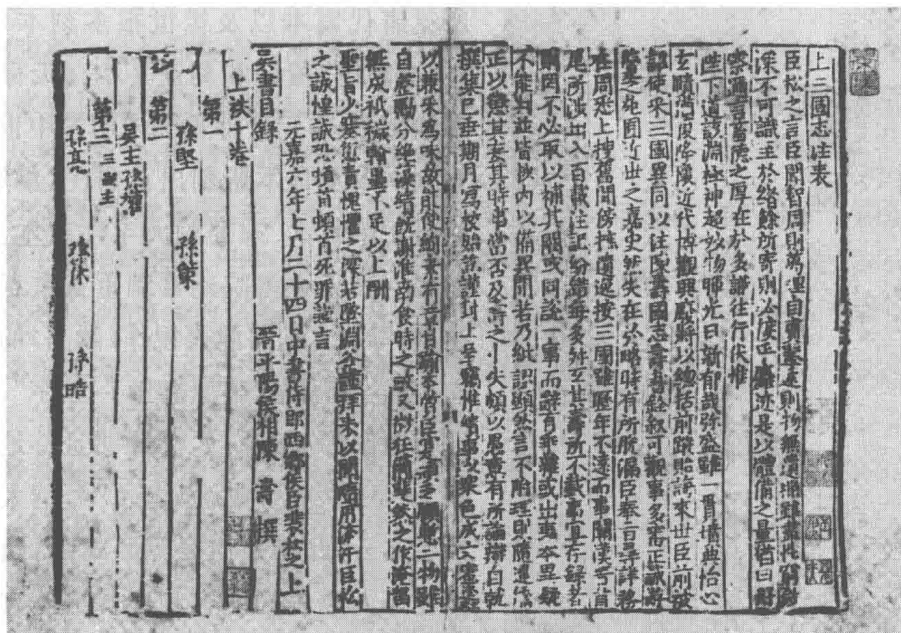
③ 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頁421。

④ 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六《藝文》之“三國志”條，頁865—866。

⑤ 陶元珍《〈三國志〉篇目考》，原刊《史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此據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196。

⑥ 繆鉞《〈三國志〉的書名》，刊《讀書》1983年第9期，頁151。

⑦ 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刊《浙江學刊》1993年第3期，頁112。



南宋初年浙中重刻所謂咸平“專刻本”《吳書》所附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刻本題作“進《新唐書》表”，而書中所鐫書名卻都依據作者題署的實際名稱鐫作“唐書”，二者是一樣的道理（歐陽脩、宋祁所修《唐書》，直到清乾隆年間刊刻武英殿本，始綴加“新”字）^①。蓋宋人自己習稱歐陽脩、宋祁所修書為“新唐書”，譬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即均將此書著錄為“新唐書”^②；吳縝所撰《新唐書糾謬》，也是為訂正歐陽脩、宋祁書的錯誤。因此，宋人刊刻此書時，便根據自己的習慣，將此進書表的標題，書作“進《新唐書》表”^③。類似的情況，又如曹魏時人何晏等撰著《論語集解》，進書表中本自講明此書“名曰《論語集解》”，而從《經典釋文》到開成石經、敦煌

① 通常比較容易見到的宋刻《新唐書》書影，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集配南宋刻本，還有倉石武四郎《舊京書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之《史部》“宋刻元修殘本《唐書》”，頁 310—313。

②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中國歷代書目叢刊》重印《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淳祐袁州刻本）卷二上《正史類》“新唐書”條，頁 920。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乾隆中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四《正史類》“新唐書”條，頁 9b。

③ 倉石武四郎《舊京書影》之《史部》“宋刻元修殘本《唐書》”，頁 310。



宋刻本《唐書》中的《進〈新唐書〉表》

所見唐代寫本以及後世很多刻本(如《古逸叢書》覆刊和刻正平本、《天祿琳琅叢書》影印元盱郡重刊宋廖瑩中世綵堂刻本以及日本所刻出自何氏《集解》的天文單經本、宋蜀刻大字注疏本、宋建陽劉氏天香書院刻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本,等等),卻將此表視作《論語》的序文,在卷端題寫“論語卷第一並序”,或徑行題作“論語序”^①,陸德明且特地說明“此是何晏上《集解》之序”^②,清人劉恭冕亦云“此必是何晏等原式”^③,這與何晏等人原表的内容和性質更有實質性出入。

《三國志·諸葛亮傳》附載陳壽進

上所纂《諸葛亮集》的表文,起首開列“諸葛亮集目錄”,繼之撮述概况,謂“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接下來就是進書表正文,謂“臣壽等言”云云,固無所謂表題在焉^④。蓋所謂“進書表”者,本來應當與所進呈書籍一同奏上,沈約撰著《宋書》,甚至乾脆將進書表寫進終篇的《自序傳》^⑤,故後世進書表的通用格式,是要在表文中寫明“所有某書若干卷册,謹隨表上進以聞”的字樣(例如北宋吳縝的《進〈新唐書糾謬〉表》就是如此,又如南宋蔡

① 敦煌存留唐寫本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2681號文書,頁228;又同書第18册P.2766號文書,頁133;第22册P.3193號文書,頁115。

②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二四《論語音義》,頁1a。

③ 清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日本東京文求堂重印埤葉山房影印清同治原刻本)卷二四,頁1a。

④ 《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頁928—931。

⑤ 《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〇〇《自序傳》,頁2466—2468。

抗奏上乃父蔡沈《書集傳》的表文也是如此)^①。檢《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抄本《說苑》，卷首前有宋人所謂曾鞏序文，實為曾氏重新校訂此書時奏上的公牘；次接目錄，接下來就是西漢末年劉向的進書表狀，首書“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云云，末稱“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謹上”^②，並未載有表題。又海源閣舊藏南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刊本《山海經》，開篇為“山海經總目”，“總目”後隨即亦為漢哀帝時劉歆（後改名為劉秀）的進書表文，首言“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云云，末云“臣秀昧死謹上”，也並沒有另外題署名目^③。現在常見的影印《四庫全書》諸閣寫本在卷首開列“提要”的做法，便是承此舊規，同樣都沒有冠加題目。裴松之注孫策傳記，曾針對孫盛《異同評》等書的駁難，維護陳壽的記載，謂“《國志》所云不為謬也”^④，可證稱陳壽書為《國志》，確實是裴松之本人的寫法。

東漢人蔡邕所撰《獨斷》，記述朝廷行用各種公文的形式，謂“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

① 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二〇三《辭學指南》之“表”條，頁3702—3703。案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見《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重印民國時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初印本）本《新唐書糾謬》卷首，頁542—543；蔡抗《進〈書集傳〉表》見《古逸叢書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本《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卷首，頁1a—3a。又案此等進書表文，在唐代或別稱之為“啓”，形式一如進書表，原本同樣沒有標題，如唐薩守真著《天地祥瑞志》之日本傳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稀見唐代天文史料三種》影印日本昭和七年抄本），在正文之前（下冊，頁7—11），即首先列有麟德三年四月進上此書時附帶的“啓”文。

② 漢劉向《說苑》（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平湖葛氏傳朴堂藏明抄本）卷首，頁1a—3b。案劉向進書表文末“謹上”二字，原本闕，此據清人盧文弨《群書拾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清人校勘史籍兩種》據民國十二年北京直隸書局影印本重印《抱經堂叢書》本）之子部“說苑”條（頁1021—1022）增補。

③ 晉郭璞《山海經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刊本）卷首之劉歆進書表文，頁4a—5b。案《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戰國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首所載劉向校定此書時奏上的《書錄》（頁1b—4a），形式亦與之相近。

④ 《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並劉宋裴松之注，頁1109—1112。